



孔子教育思想論文選

(1949—1980)

教育科学出版社

孔子教育思想论文选

(1949—1980)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育史研究室 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汇集了建国以来教育界及学术界评论孔子教育思想的有代表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种种评价和研究成果,可供教育科学工作者、史学工作者、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和师范院校师生了解和研究孔子教育思想参考。

孔子教育思想论文选

(1949—1980)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育史研究室 编

*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燕华书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125字数 211,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书号: 7232·80 定价 1.15 元

编者的话

一、建国以来教育界及学术界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展开了广泛地讨论。为了便于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以及有关同志了解和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选辑了这方面的论文十六篇，供大家研究参考。

二、本书选辑的只限于专论孔子教育思想的文章及教育史专著中的孔子章节，所选辑的文章按照先综合论述后专题论述的次序编排。

三、编入本书的文章，大都由作者作了校订，个别文句由编者作了改动。

四、限于篇幅，许多文章难于一一编入。为便于读者查阅，我们将建国以来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文章，编了一个目录，附在本书的后面。

五、参加本书选编、校勘的为马竞先、杨焕英同志。

六、限于我们的水平，本书编辑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指正。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育史研究室

1981年6月

目 录

孔子的教育思想·····	陈景磐 (1)
孔丘的教育思想·····	毛礼锐、邵鹤亭 (43)
伟大的教育家孔子·····	沈灌群 (69)
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王子英 (88)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	骆啸声 (103)
论孔子的教学方法与治学经验·····	曾扬华 (120)
孔子论学习方法·····	许梦瀛 (129)
孔丘教学教育方法的再评价·····	杨荣春 (143)
中国历史上的大教育家——孔夫子·····	钱远谔 (152)
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文献整理工作·····	钟肇鹏 (165)
论孔子与教育·····	卢南乔 (182)
从《论语》看孔子的教学活动和孔门的师生关系·····	江 浦 (192)
再评孔丘的“有教无类”·····	张瑞璠 (204)
论先秦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	王 越 (213)
关于孔子首创私学的问题·····	于盛庭 (228)
孔子关于教师的理论和实践·····	骆承烈 (233)

附录

建国以来评论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文章目录

孔子的教育思想

陈 景 磐

绪 言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尤其是在我国教育史上，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对于我国文化教育的影响极大，在国际上也负有盛誉。但是，目前我们对这位重要人物的意见还相当分歧。本文只能对这位大师的教育思想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希望能引起“争鸣”，对孔子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是，他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各时代、各学者对他常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例如：

在他那时代，他常被称为“夫子”，他不敢接受“圣人”的称号，仅希望作一个“君子”^①。战国时代，他常被称为“圣人”，含有“大而化之”的意义^②。即使是儒家的反对派韩非，亦称他为“圣人”^③。但是，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他的学说并没有得到当权统治者的采纳，其中某些保守部分还受到进步的思想家所反对。

秦汉以后，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建立起来了，他的学说得到了封建贵族的大力支持，成为我国二千多年来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历来的封建统治阶级都利用孔

① 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

② 《孟子·尽心下》：“大而化之谓之圣”。

③ 《韩非子·五蠹》：“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

子的学说来约束人心、麻痹人民、抵制进步势力；都把孔子抬得非常的高，并且给他涂上了王者或神明的色彩，把他化装起来，弄得他面目全非。本来，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夫子”，一个“教授老儒”，竟然坐上王位或神位，受天下人盲目的崇奉，这是与他本人无关的。例如：

汉人常目孔子为神，说他是什么天神“黑帝”之子，能先知秦始皇之坑儒及其沙丘之死，甚至他住屋的墙壁亦能发出音乐，以阻止鲁恭王的拆屋。汉明帝永平二年，孔子的图象正式输入全国各级学校，受全国师生的崇拜与祭祀，此种仪式继续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废止。有时他亦被尊称为“素王”。

唐、宋时，孔子正式被封为王：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孔子被封为“元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五年改封为“至圣文宣王”。元朝依旧例，在大德十一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清两代，由于帝王的权力提高，孔子的王位也保不住，从王位降到师位。例如，洪武十四年，命全国各地毁孔子象，代之以木制牌位，称孔子为“先师”。嘉靖九年，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庙为“先师庙”。清沿旧制，亦称孔子为师。顺治二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改封为“至圣先师”，康熙二十三年帝亲题“万世师表”四字悬之于各地文庙。孔子虽然不称王而称师，但是他的势力和影响还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变。

清末民初，“今文家”复兴，尊孔子为“教主”，其地位与天地等同^①。民国三年，他们成立了“孔教会”，并建议国会以孔教列入宪法，定为国教，虽以二五五票比二六四票失败，但这也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势力的雄厚。

伟大的“五四”运动以后，孔子的地位起了根本的改变，“五四”

① 参考：康有为《孔子改制考》，1920年南海康氏北京重刻本，卷10第1页。

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乃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①。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人——孔子，他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当然是要被推翻的。所以“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在当时文化界中是很高的。

但是，当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内，为了麻痹人民，奴化思想，孔子又很快地被恢复到与天地日月同等的崇高地位^②，孔子所提倡的封建道德，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又正式被公布为“陶融儿童及青年……之国民道德”，并以之作为各级学校的教育宗旨^③。这种教育宗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早被当时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雄的旗手——鲁迅彻底地揭穿^④。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明白指出：“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半封建文化）的代表。”^⑤

当然，中国社会发展到脱离封建主义的时期，孔子所代表的封建文化，这种上层建筑，无疑的是反动的，是要彻底地加以摧毁的。但是，毛主席指示我们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3页。

② 例如：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孔子歌”：“天高兮！无不复；地厚兮！无不载；日月之明兮！无不照；……”。

③ 参考：192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公布的《教育宗旨与实施方针》，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④ 鲁迅指出：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育宗旨，不过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珂德》）。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88页。

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①

毛主席这种指示，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研究孔子的指导思想。孔子对于我国封建制度的形成，封建文化的创造，曾起过极重要的作用。我们研究孔子，不能是“颂古非今”，而是要给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一定的科学地位”，批判他落后的部分，吸收他有用的部分。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即旨在指出：孔子基本上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最大的贡献主要的也是在教育方面，我们从他的教育思想中可以得到不少对我们有益的东西。^②

研究孔子最感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的资料问题。一方面，因为有关的资料太多，难以完全掌握，加以我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在我国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更加深了研究孔子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应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书，许多儒家经典的可靠性发生极大问题，例如从前的“新古史派”就认为“孔子与五经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这个结论不一定可靠，但是这也多少可以表明研究孔子的资料问题的复杂性。不过大家对于《论语》这一部书都承认其可靠性为最大，就是号称“疑古”的钱玄同，也承认其真实性^③。所以本文研究的材料就以《论语》为主要的依据。至于我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即孔子所处的时代问题，则采用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即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在这（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四七五年）之前的春秋作为奴隶社会的末期，在这之后的战国作为封建制的初期。”^④其详细的理由，本文不拟援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00—701页。

② 参考：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北平朴社出版，第69—70页，钱玄同说：“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我们要考孔丘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最可信据”。

③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5页。

孔子论教育的作用

孔子对教育非常重视。他认为教育是和政治分不开的，教育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所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参加政治工作，他的答复是，他的从事于培养人的品德，使人能“孝友于兄弟”也就是政治工作，不一定要实际参加政治才算是政治工作^①。实际上，孔子之努力于教育，也就是为培养自己的实力，作为政治的资本，能更有效地推行他的政治革新运动。

孔子把教育和人口、财富作为立国的三大要素：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孔子承认老百姓应该受教育，这与奴隶时代教育为贵族所垄断，奴隶生产者只被看作能说话的工具，被剥夺了一切受教育的机会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大步。同时，孔子在这里也明显指出经济在先，教育在后的必然关系，这也是很正确的。

孔子承认人的知识和道德都是要靠学习培养出来的。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除了“上智”和“下愚”之外，他以为一般人的禀赋都是相差不久的。人之不同，一般说来，都是教育造成的。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他自己说他不是“生而知之”，他之所以多能，乃是由于他的努力“好古敏以求之”（《述而》）的结果。他之主张“有教无类”，也是从他的“性相近”的思想出发的。他之重视教育，强调教育的作用，注重启发民智，对中国几千年来重视教育的传统给予极大的影响，使当时

●

①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学术下庶人，把文化教育从“官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有极大的进步作用。

孔子对“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解是不明确的。他相信人天生是有区别的，有“生而知之”、有“学而知之”、有“困而学之”、有“困而不学”^①。“生而知之”者大概就是“上智”吧，但是孔子从来没有允许任何人物“生知”。大概孔子的“生知”只是“虚悬的一格”，在他的思想中不占重要的地位^②。所谓“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者大概就是“中人”，包括有当时的贵族、地主和一般自由民；“困而不学”的大概就是属于“下愚”或奴隶生产者之类，他说：“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他们不能接受中人以上的知识，所以“不可以语上”^③，他们只可“小知”，而不可“大受”^④。

孔子对于“学”的能力虽然分为等类，但是对于“教”则主张“有教无类”，不论什么人只要送给他一点“束修”，他就可以施教^⑤。即使是奴隶或“鄙夫”，如果合乎条件，他也是乐于施教的^⑥。他的学生中如子张、子路等人，都是从鄙夫出身而为士的，孔子皆以君子之道勉励他们、培养他们。对从不名誉的“互乡”来求学的童子，虽然他的学生反对，但孔子还是接受他们，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述而》）。对不懂礼貌的“阙党”童子，孔子也还是传命以教之（《宪问》）。他的“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精神，是我国教育史上一种宝贵的传统。而这种“有教无类”的精神，正是从他对人

①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② 参考：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173页。

③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④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卫灵公》）。

⑤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⑥ “有鄙夫（即小人，当时奴隶生产者）问于我……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

民的爱出发的。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他这种“爱人”的精神也是反映当时时代的进步要求的。

孔子虽然主张教育不分等类，但是，他的教育的主要对象乃是士，奴隶生产者不是他教育的对象。他认为奴隶们只可以“小知”，不可以“大受”。他们主要的可以学稼、圃、当兵（“即戎”）等鄙事。他也主张奴隶们应当受适当的道德教育，例如：不教而杀人，他称之为“虐”（《尧曰》）。为政总要教民，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在他到卫国时与他的学生冉有所讲的为政的三个步骤——庶、富、教中，就很清楚地可以看得出来。所谓“下愚不移”，乃是奴隶们不能超越“中人以下”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内，教育还是可以发生作用的。孔子对他们的教育虽然也重视，但是他们不是孔子教育的对象，所以有人请他讲“军旅之事”，“稼”、“圃”的方法，都被他拒绝了^①，因为学稼、圃不是学为士，而孔子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士从政的能力，所以稼、圃等体力劳动就不属他教育的范围，正如代表手工业出身的士的墨子一样，他也仅是“坐而言义”，也是不讲“耕织”的^②。孔子教育的对象主要的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属于治人阶级的劳心者。他的教育基本上是为他的本阶级服务的。

孔子是相信“天命”的，“畏天命”乃是他理想的人格，是“君子”三畏中之一^③。但是，孔子是重视人的力量 and 价值的，他主张身体力行，他不是一位纯粹的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者。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如果一切都是由天命所定，那么，他的“有教

① 卫灵公问阵，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子路》）。

② “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之哉’，子墨子曰……‘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墨子·鲁问》）。

③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无类”、“诲人不倦”的思想，就不可理解了。正如墨子批评当时儒家的相信命定论，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包裹头发）而去其冠也”^①，主张命定论，同时又主张教育，这无异叫人戴帽，同时又叫人脱帽，同样是矛盾的、不合理的。其实，孔子言命，含有自然界的必然性的意义，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发展和支配自然的必然性^②。但是孔子的“命”是不大明确的，所以他的学生子夏所“闻之”于孔子的话，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便为我国历代统治者所利用，作为宿命论的口号，来麻醉人民，使人民“贫而无怨”，甘心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

孔子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学的主要对象是士，他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士成为他理想的人才，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找到政治的地位和保障，从而改善春秋以来“天下无道”的局面，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他反对当时贵族们对政治、文化的包办政策，所以主张“举贤才”，不论出身，有贤则举。例如：“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公叔文子荐他的家臣和他自己同进为公朝之臣，孔子大加赞扬，称之为“文”（《宪问》）；孔子对晋国魏舒的“举贤”表示非常赞同，称“魏子之举”为“忠”、为“义”^③。孔子的大半生就是为培养这种“贤才”而努力。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孔子所要培养的理想人才，什么是孔子所认为的理想社会呢。

按《论语》等书的记载，孔子所认为理想的人才有“圣人”和“君子”二种。前者可称为他的最高的理想人才，后者是他的最低的理想人才。

① 《墨子·公孟》。

② 参考：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3—104页。

③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关于“圣人”的品格，孔子说得不多，但是他亦约略提到，作为人类人格最高的理想。圣人就是能够为全世界人类谋福利，能够促进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实现，使奴隶和一切人民的生活能够获得改善；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①、“修己以安百姓”②。在孔子的心目中，只有圣王尧、舜才略具这种品格，但是，“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他们也还不能算是完全达到了这个理想。后人虽然称孔子为圣人，他自己却始终不敢以圣人自居，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他很满意见到人们能够达到一种最低的理想人才——“君子”的标准，这种人的品格是孔子常论道的，是他自己愿意努力以赴的目标，也是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够达到的标准。他说：“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

孔子对“君子”的品格非常重视。在《论语》中论到君子就有九十余次之多。他的教育目的，主要的就是要培养士成为君子。君子的品格如何呢？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大概说来，君子的品格可分为二方面：对己能“修己”，对人能“安人”、“安百姓”。要安人必先修己，要从政治的人，自己必先有健全的人格，“知所修身，则知以治人”。修己之道主要有三：即智、仁、勇。孔子一再地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③。这就是《中庸》所谓：“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换言之，君子修己的工夫，应注意德、智、体三育各方面的发展。不过，孔子所最注重的是君子道德方面的

①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

②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③ 例如：《论语》：《宪问》、《子罕》。

修养,尤其是“仁”与“礼”两方面的修养。修己的目的在于“安人”、“安百姓”,就是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但是必须指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是具有阶级性的。孔子所谓“君子之道”,基本上就是治人之道。不过在春秋以前,“君子”原是贵族统治者的专称。孔子要培养“士”——新兴的地主阶级,成为有能力的统治者,所以把“君子”含义的范围加以扩大,成为一般的统治者理想的人格。并且也相应地照顾到被统治者的利益,把“爱人”的德行列为君子主要的品德。这在当时说也是进步的。

孔子的理想人才有圣人和君子两个阶段,他所要达到的理想社会亦然。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为五霸之首,可以代表当时争夺纷乱的社会。所谓鲁,决非当时的鲁邦。鲁在春秋时代是一个弱国,始受制于齐,继受制于吴、越。孔子对当时鲁国的政治是不满意的,他曾因鲁乱而逃于齐,鲁不能说是怎样的优于齐的。鲁原为周公故土,周公政治久为孔子所称道。“至于鲁”,当为周公统治时理想的鲁,亦即《礼运》篇所称的“小康”的社会——“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世。这是儒家所认为现实的或最低的理想社会。这种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其理想的人格即上述的“君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号为“六君子”。君子最重要的道德为仁道,不过这仁是有条件的、有差别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仁之本”为“孝弟”(《学而》),“仁之实”为“事亲”(《孟子》)。这种有条件有差别的仁,不是孔子最高的理想社会的仁。“鲁一变,至于道”,这种最高理想的社会,乃是《礼运》篇所称的“天下为公”的时代,大道得行的“大同”社会。这“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一种最大不同点,就是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家族、阶级的观念完全打破,仁变为大同的仁,无亲疏贵贱的差别。这种社会理想的人,即上述的“圣人”,尧舜就是其中的代表。圣人最重要的道德,不是有差等、有条件的仁,乃是“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的仁；不是“亲亲”的仁，而是“安百姓”的普遍的仁。这种理想的大同社会的圣人的仁道，孔子只能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运》）。

《礼运》篇所载的孔子之言，虽多出后儒之手，但不能说它是完全凭空虚构出来与孔子丝毫无关的。相反的，其中主要的精神与《论语》颇多吻合，可以互相说明，自不能因其后出，完全抹煞其与孔子的关系。孔子对奴隶制时代的君主继承权，即父子相承的家天下制是不满意的。他是主张“举贤才”，反对贵族世袭制度的，他对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制，即原始公社时代的族长传承“选贤与能”制非常向往。他把对尧舜时代的憧憬作为理想，也是他对当时现实不满的一种反映。

孔子把社会看成是“变”的，是在不断变动发展中的。这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给当时的社会革新运动一种理论上的基础。他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说是一种“托古改制”，借着古圣王的权威来改良当时的社会。他反对一下子完全推翻当时的社会秩序。第一步，在形式上他还是主张基本上保留从西周传下来的旧制度，不过他要求在旧形式上灌输一些新精神，提高人的价值，改善人民的生活，使新兴的社会力量能够得到政治上的保障和发展的机会。最后，他想实现他的理想，即他所憧憬的唐虞盛世的社会秩序。

为了改良当时的社会，孔子还提出“正名”的政治主张^①，作为他教育学生的重要目标。他说：“政者正也”（《颜渊》），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作国君的必须有国君的道德，能“节用而爱人”（《学而》），能够礼贤下士；作臣子的应该是“贤士”，要能佐国君行德政，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尽量做到“胜残去杀”，减轻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②。所以他主张“举贤才”、行

①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

② 例如：当他的学生冉求做季氏宰，替季氏聚敛、急赋税，孔子非常愤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德政,反对贵族专政,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找从政的机会,为奴隶的解放、人民生活的改善,创造条件。这种观点是和当时奴隶主贵族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正名的另一意义,就是以古名为标准来正今之实。孔子认为当时社会主要的毛病就是名存实亡,虽然保存有西周制度的名,却并没有西周制度的实。孔子坚持要保存西周的典章制度的旧形式,作为行动的规范,主张“贵贱有序”,维护等级制度,以忠孝作为道德的重要基础。这是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有利的,也是历代封建帝王之所以崇拜孔子的重要原因。

孔子虽然提出了他的理想社会,但是他没有能够找到达到他理想社会的正确途径。他不了解当时社会的纷乱,乃是由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当时奴隶制度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因而他不能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他建立并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属于地主阶级的士的集团,作为革新当时社会的力量,并从事于政治运动。他所领导的士的集团的政治活动方式,完全是采取一种温和主义,就是子贡所说的“温、良、恭、俭、让”的方式^②。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一种折衷调和主义,凡事折衷新旧、去其泰甚。他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原则上他不主张武装斗争,只用“上说下教”的教育方式来调和阶级矛盾。有时他的党徒们稍为“狂简”一些,他就大加斥责,说:“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所谓调和矛盾,其本身必然以自己矛盾的立场为立场。孔子思想的矛盾和他的折衷调和主义,是与他的贵族性的地主阶级的矛盾立场分不开的。我们承认,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先驱者”^①。凡事开头难,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他固然有保守的一面,但是他的进步的一面却是主要的。

①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

② 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